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朱 荟, 陆杰华

摘 要: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 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 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 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 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 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 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 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关键词: 人口大变局; 新全球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

DOI: 10.13471/j.cnki.jsysusse.2024.01.016

面对百年未有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优化变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体共识与关键议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以来, 我国致力于化理念于行动, 在和平、安全、发展、人权与社会等全球治理的多个重点领域提出倡导, 并积极践行开放、团结、合作和进步的多边主义与共赢原则。为进一步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冲突、经济社会风险与人口可持续发展危机等世界性挑战, 我国于2023年9月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 再次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中国方案, 指明共建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行动方向, 充分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责任担当。与此同时, 人口与安全、人口与环境、人口与公共卫生等世界性人口问题的全局性影响远超预期。在中国语境下, 以人口规模巨大为首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人口治理的范式创新无疑是具有重大示范意义的, 极大地丰富了全球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外延。不再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让渡”“超国家机制”或“没有政府的治理”等既有视角, 而重点强调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同源与战略合集。

一、新的动荡变革期呼唤世界人口治理的再转型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大变局意味着大调整与大发展, 全球公共治理将迎来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吴志成, 202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当前的世界发展格局复杂且严峻, “世纪疫情影响深远,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 2022)。这一世界性的动荡局势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所面临的新时代鲜明特征, 也意味着国际大环境正处于国家力量分化、国际关系重组与全球治理

^{*} 收稿日期: 2023—08—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战略协同研究”(21&ZD189)

作者简介: 朱 荟,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天津 300350);

陆杰华,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体系重构的重要战略期。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响应《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宣言》(UN75 declaration-A/RES/75/1)所提交的《我们的共同议程》(Our Common Agenda)报告中,其开篇提出的振聋发聩之问:“当前,世界正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所遭遇的最大的共同考验。我们面临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抉择:是走向崩溃,还是谋求突破?”(联合国,2022)毋庸置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80亿人口一道面对着局部战争冲突、人口负增长转变、超低生育水平蔓延、重度老龄化进程加深、经济形势下行衰退、贫困与不平等加剧、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威胁、资源日渐匮乏以及极端气候变化等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巨大挑战,这些接踵而至的人口潜在危机将深刻影响着全人类共同的命运。而愈是国际人口形势的复杂交织,愈是彰显出全球人口发展的重大机遇,愈是召唤世界人口治理体系进行战略性与全局性的改革。为解决2015年以来出现的多重发展危机,联合国呼吁在2023年举行部长级会议和2024年召开未来峰会,倡导政府及多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各成员国也相继发表承诺:为走向更绿色、更美好和更安全的未来,加强全球治理,造福今世后代。

为推动世界人口走出“动荡变革期”,中国方案进一步深化既有的全球治理方略。一方面,从全球治理的学理层面上说,世界人口治理迫切需要转向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目标和以迈向公共服务为治理范式的新全球治理(薛澜,俞晗之,2015)。当前,人口问题与各种全球化问题相互交织联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伴随着单一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结构老化、人口红利消退、人口健康风险加剧、人口负增长进程加快等传统人口领域的挑战,而且人口发展赤字、人口安全赤字和人口生态赤字等全球人口赤字表现得更加多元多样且难以消除。上述困境充分说明人口领域缺乏成熟且完善的全球治理规制,或者目前的全球治理并未对世界人口均衡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亟待新的治理理念与规则去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以引导与重塑国际人口秩序(庞中英,2016)。另一方面,从大国行动的实践层面上说,中国在探索人口治理新模式与谋求人口发展新方向上颇具人口大国特色与世界样板意义。秉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一体推进的基本路径,我国逐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在人口与国家安全、人口与经济繁荣、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与资源气候环境等方面倡导“一带一路”“脱贫攻坚”“健康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等重大决策,实施乡村振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国家战略,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民生福祉等方面持续努力(陆杰华,2023)。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中国模式而与众不同且充满活力,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在全球人口治理的世界舞台上焕发生机。

当下,世界人口发展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全球人口治理的新道路选择。换言之,全球人口发展仍在动荡变革的局势中艰难地演进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国家治理与世界人口的全球治理的互促共进,将构建全球人口治理体系的新格局与新范式。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份独树一帜的全球承诺与中国引领,标志着大变局下我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人口治理体系改革,尝试为化解世界人口发展危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正因如此,本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由此展开。首先,在全球风险视域下判断世界人口大变局的现实状况及主要特征;其次,基于世界人口治理的历史实践,提炼新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及理论主旨;最后,总结中国在世界人口大变局的新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与使命担当,以期阐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全球治理价值。

二、重新认识风险视域下人口大变局及其世界属性

事实上,学界对于“人口”的认识,始终滞后于世界人口模式的变迁。究其原因,在于学术界关于人口发展的讨论囿于三个方面的既定思维方式,即“总量主义而非结构主义”“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个人选择而非公共事务”。其一,总量主义而非结构主义的视角难以摆脱马尔萨斯人口学的深刻烙印,过

于强调人口总量的控制、调整或管理,从而在世界人口少子化、老龄化与负增长的新局势中失去应有的解释力。其二,国内问题而非国际问题的视角通常将人口事务框定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内部运行机制之中,认为人口问题并不关涉国际关系或全球化议题,因而对世界人口进行全球治理的广泛共识度、议程核心化以及改革紧迫性则更显薄弱。其三,个人选择而非公共事务的视角将人口问题往往局限于微观层次,认为生育意愿、健康管理或就业选择等人口与社会经济结果是个体化行为,人口与政治、人口与环境等宏观议题才是治理议程设置的核心内容。而现实则是关乎日常生活和民生福祉的人口问题具有极强公共性、高度敏感性及现实紧迫性,应被置于治理程序次的优先位置。因此,重新认识世界人口大变局的基本样貌及主要特征具有必要性。

第一,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大转向,彻底打破了“总量稳定均衡”的理论预设。超越西方经典人口转变的理论预测,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内进入长期负增长阶段。基于数千年传统农业社会和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及现代化的人口动态变化历程,西方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世界层面人口再生产过程将经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增长率”到“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增长率上升”的初期人口转变,再到“出生率下降、较低死亡率、较高增长率”的中期人口转变,以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后期人口转变,直至人口总量趋于均衡稳定(Kirk D, 1996)。随着1972年德国、1992年俄罗斯和2005年日本相继进入人口负增长状态,2018年发达国家整体性迈入负增长(朱荟,陆杰华,2023),以及2022年中国这一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步入负增长(国家统计局,2022),世界人口长期均衡稳定的理论预测被彻底打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在《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修正此前关于“世界人口将在21世纪持续增长”的说法,初步预测世界人口将于2086年进入负增长(United Nations, 2022)。与此同时,一项基于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所预测的世界人口发展前景(2017—2100年)的研究,再次将世界人口负增长的时间节点提前至2065年(Vollset S E, Goren E, Yuan C W, et al., 2020)。由此可见,人口负增长将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现象。回溯学术界对西方人口转变的反思,虽提及民族国家与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口转变的阶段性与差异性影响,并且从移民视角对欧美发达国家为主的第三次人口转变进行细致刻画(Coleman D, 2006),但是仍在根本上忽视对世界人口负增长这一人口大变局的理论前瞻与风险应对。

第二,世界人口新风险与大动荡,决定了人口问题的超国家属性。当今世界人口所面临的全球风险与安全危机,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制约经济发展,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高社会福利矛盾等传统人口发展困境,而与新冠疫情突袭、气候行动中断、社会不平等加深、地缘战争冲突等事件深度关联。自从两百多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出版以来,对人口危机的深度担忧一直在国家实力博弈的框架中延伸。正如《国家间政治》对人口与国力的关系描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口来创造和利用国家力量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国家。但在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也可能对国家力量产生极端负面的影响。”(汉斯·摩根索,2005)在后工业社会与新社会风险的界定下,人口规模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工业扩张的劳动力供给,而且与捍卫国家主权的国防需求息息相关,人口秩序更是与社会关系、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等问题相互嵌入。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全面而深刻地展示了全球人口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技术领域的风险图谱(World Economic Forum, 2023)。这一项在17年间反复监测的风险报告提示我们,全球风险视域下的人口发展危机进一步体现出全球化、国际政治与国家之间深度关联等核心特征。可以认为,全球人口风险并不仅仅是生育、死亡和迁移等人口单一领域内的危机,而是依赖一个全球性的宏观层面的人口发展困境所呈现出来的。毋庸置疑,先进统计技术与大数据的应用再次证实了世界人口发展具有全球性,而非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独特性。人口学家基于观察到的国际与国内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健康等人口事实及变化,并在限定参数与变化情景中进行全局性的指标测量、整体性的趋势预测与综合性的模

型仿真。需要提醒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人口发展面临的潜在重大风险不言而喻。

第三,大变局呼唤大调整,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分类序次与议程设置。在重新认识人口大变局的世界属性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从影响范围与兴起时序两个维度选取全球人口治理的核心议程。既有人口治理的学术讨论大致沿着两个方向的研究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是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等学科的主导下,在宏观层面讨论世界人口发展的国际局势,其基本概念、理论框架与实践经验往往具有整体主义倾向,例如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大变革的范畴下讨论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秦亚青,2013)。第二条路径遵循经济学、社会学与人文地理等国别比较的思路。这条路径下的研究内容多是实证范式,大多是在微观层面上对人口红利、生育意愿以及社会保障等人口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例如比较在欧洲不同福利体制的国家中,家庭政策对胎次生育率及女性就业率的差异化影响(Thévenon O,2011)。有别于上述宏观或微观的研究理路,在认识及应对世界人口问题上应从中观层面考虑到特定人口问题领域的实践性,即关注世界人口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的议程设置。图1依据影响范围与兴起时序,将社会、经济、技术、政治和环境五个方面的全球人口风险进行类型学划分。其中第一象限中影响范畴广泛且新近议题应优先关注,如“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中的生活费用危机、社会凝聚力侵蚀、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其后依次是第二象限中影响范围较小但较为新兴的“人口与技术”议题,以及第四象限中影响范围较广但已经达成国际共识的“人口与环境”议题;最后是第三象限中影响范围较小且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人口与政治”议题,如限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按照既有经验,拉美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低政治性”和“高紧迫性”的现实问题是全球治理国际议程的首选类别(张发林,2020)。据此逻辑,全球人口风险的世界性应对,需要在现实复杂性中强调新危机意识,关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日常叙事,而不仅仅聚焦于政治或环境等传统维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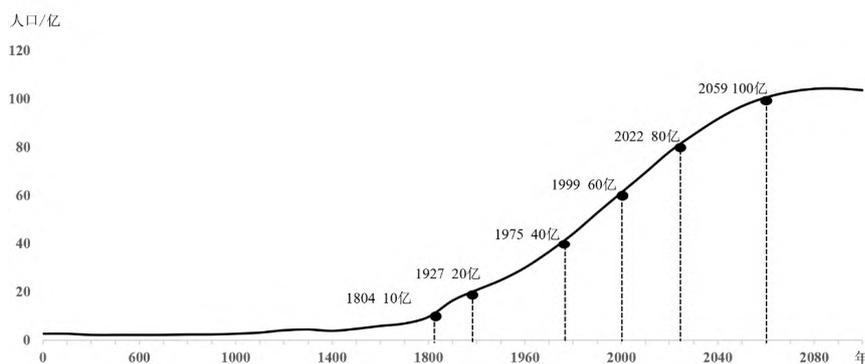
注:结合全球人口风险图谱,作者自制。

图1 全球人口问题的分类设置

三、全球治理视域下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构建历程

世界人口的增长变化极富戏剧性,其发展轨迹的几次重大转折往往与人类社会的技术运用、制度设计和文化变革紧密相关。正如图2所示,百万年前,原始社会的世界人口极其稀少,更无法使用年增长率等人口指标记录世界人口变化趋势;农业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直至公元元年,

世界人口约为2.5亿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仍不到0.04%。工业革命不仅开启了现代文明进程,机械化、电气化和城市化等技术大革命重塑了世界人口的增长轨迹,人口年增长率开始激增,如英国高达1.3%(侯文若,1991)。工业时代开始初期,约在1800年左右,世界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人;再过百年后的1930年前后,世界人口突破20亿人;短短的三十年内,世界人口于1960年达到30亿人,此时的世界人口年增长率高达2%,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增长(吴宗钊,1984);而至1999年,世界人口翻一番到60亿人,只经历了不到四十年。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人口增长速率逐渐放缓,70亿人和80亿人的达到时点分别是2011年和2022年(United Nations,2022)。联合国和全球主要人口研究机构预测,世界人口新增到下一个10亿人的时间会更长一些,预计在2035—2040年之间。在更加低速的增长态势下,世界人口将于21世纪后半叶,攀升至百亿人口的峰值点,随后进入逐渐下行的人口负增长通道之中。



注:结合文献和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数据,作者自制。

图2 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公元元年—2080年)

然而,关于世界人口治理却并不是一个自人类诞生以来即存在的问题。虽然早在公元前789年,我国周朝时期就有了“料民”这一人口调查形式(国家统计局,2023),但是工具理性下的中国古代人口思想过于强调“控制”(段塔丽,2002)。无独有偶,西方社会对人口的理解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性。文艺复兴时期,学术化的人口思考逐渐摆脱宗教束缚,开始重视对“人”“人口”“人民”以及“人类”等人本主义进行关注。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尝试从人性的思考推导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不可否认,理性主义为人口研究赋予了科学的意义。19世纪以来,人口数据收集更加提倡方法论的实证化;在《人口原理》《自杀论》等量化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影响下,现代人口学不仅进一步奠定了社会统计的实证根基,而且将人口的讨论范畴扩展至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其他科学领域。即便如此,人口学在理论上的重大建树,却未能在实践上推进世界人口治理的全球共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迎来了一轮婴儿潮,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均出现快速的人口增长。在世界人口释放巨大红利之时,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全球性人口问题。为此,1954年,联合国在罗马召开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世界人口治理的全球进程正式拉开序幕。在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双重逻辑下,从“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来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么样”五个层次的发展推演中(俞可平,2002),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构建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以倡导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开启构建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探索阶段(1954—1973年)。在构建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初始阶段,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即是“为什么治理”,更进一步地说,为什么需要全球治理?毫无疑问,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是建立在超越国家、种族、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之上的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这一全球共同利益导向的核心理念是世界人口治理体系第一层级的规范性原则(刘宏松,2023)。国际人口治理活动以此全球共同利益为根本,相关国家和地区治理行为主体自愿遵守共同体的意志。从1954年和1965年前两届世界人口大会的筹备背景

与发言文件可以看出,全球共同利益的话语体系为构建世界人口治理理念奠定基础(邬沧萍,1979)。联合国呼吁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将调节生育作为人口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并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资助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在多个国家同时启动,世界人口治理的全球格局亦初具雏形。

第二阶段:设置全球治理的规则安排,融入构建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成长阶段(1974—1993年)。建立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全球规制(global regimes)就是将人类普世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原则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换言之,在构建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第二个阶段必须回答“如何治理”或者说是“依靠什么治理”这一关键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规制在构建世界人口治理格局过程中具有核心意义。正是由于全球规制的制定与实施,才能够将应对世界人口问题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施政走向全球范畴下的共同治理。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全球规制之设立以1974年第三届世界人口大会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The World Population Plan of Action*)为标志。109条行动计划被135个国家所共同认可并执行,确保人口政策嵌入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之中。这充分表明世界人口治理格局已经实现制度化构建。

第三阶段:明确全球治理的主体单元,标志着构建世界人口治理格局进入深化阶段(1994—2014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前十几年,既是世界人口急剧膨胀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世界人口治理格局完成全球治理组织架构的深化阶段。这一阶段中,世界人口治理进一步回答了“谁来治理”的重要问题。1994年在联合国支持下举办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不仅有超过180个国家或地区出席,而且吸引了11,000多名联合国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员参会。会议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更是将“国家行动”“国际合作”,以及“与非政府组织的伙伴关系”单列为三个行动章节,也将世界人口治理活动区分为国家级、区域级和国际级的具体细类。此后,1999年和2014年两次特别会议中,均进一步重申了世界人口治理格局中多行动主体如何更好地构建伙伴关系,实现协作互助与调动资源。至此,各国政府当局、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正式国际组织,以及大量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为世界人口治理构建出一个完备有序的多行动主体格局。

第四阶段:细化全球治理的客体对象,表明世界人口治理格局逐渐迈向稳健阶段(2015—2023年)。进入更加稳健状态的世界人口治理格局,进一步突破了聚焦在生育、老龄化、死亡和迁移等传统人口过程的固有思维,将世界人口治理到底应该“治理什么”这一重要问题全面拓展(蔡国华等,2005)。2015年联合国会员国商定通过的《2030年议程》,确定了17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人口战略(2018—2021)进一步确定了其核心领域,如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改善青少年和孕产妇健康、实现性别平等、解决武装冲突等,将“大人口观”应用于人口与政治、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等广义范畴。可以认为,近十年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愈发宽广与深刻,人口问题与禁止核武器等全球安全问题、资源保护及合理利用等生态环境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问题、传染病和慢性病管理等公共健康问题,以及社会团结及社会凝聚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共同构成世界性人口发展议题,反映出世界变局中人口治理的复杂面向与多元维度。

第五阶段:前瞻全球治理的未来结果,揭示出既有的世界人口治理格局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2024年以后)。依据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关于“治理得怎么样”的评价至关重要,这一效能评估是检验治理体系有效性与成熟度的关键。全球化是当下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人口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结构、方式、过程及意义。国际人口秩序不可能通过传统的民族国家与单一的政府体制所创立及维护。那么,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的全球治理效能,即这一套建立国际人口环境、国家与区域的协同能力、复杂行动主体的多边体系是否能够适应百年未有之人口大变局,将成为下一个发展阶

段的主要任务。以2024年联合国将举行未来峰会(The Summit of the Future in 2024),商讨一项面向全球治理行动成效的《未来契约》(An Action-oriented Pact for the Future)为标志,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真正走上了一条从依靠政府管理到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治理之路。

四、从跟随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治理卓有成效,在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延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提升人均GDP等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仅以人类预期寿命这一指标为例。19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为47岁,而到2021年达到71岁(增加24岁)。这一显著的增长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欧洲的这一指标从63岁增长到77岁(增加14岁),与此同时,亚洲和非洲的预期寿命分别从42岁增长到73岁(增加31岁)和从38岁增长到62岁(增加24岁)。中国的优异表现更是让人赞叹,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4岁增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8岁(增加34岁),当下中国平均预期寿命甚至高于美国和较发达国家的同期指标。中国作为拥有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遭遇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极端负面冲击之下,2020—2022年平均预期寿命并没有急剧下降。再从人口与经济的角度观察,20世纪中叶,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的生活窘境之中,而现在这一比例仅约10%。可喜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中国的人均GDP从不足30美元增至12,556美元,实现400多倍的增长(国家统计局,2023),并且在2020年底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此外,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超低生育率风险。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正式进入长期、稳定且深度的人口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韩国统计局公布2022年全韩新生儿数量为24.9万人,总和生育率为0.78。毋庸置疑,生育领域的人口治理是世界生育率极低地区的重点议题所在,但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治理成效斐然。

中国与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治理比较(1950—2021年)

国家和地区	自然增长率 (‰)		出生率 (‰)		总和 生育率		预期寿命		60岁以上人口 占比(%)	
	1950	2021	1950	2021	1950	2021	1950	2021	1950	2021
世界	17.3	8.2	36.8	16.9	4.86	2.32	46.5	71.0	8.0	13.7
中国	17.9	0.2	41.0	7.6	5.81	1.16	43.7	78.2	8.0	18.1
美国	13.2	1.3	22.8	11.1	2.93	1.66	68.1	77.2	12.2	23.0
较发达国家	11.8	-2.2	23.0	9.5	2.84	1.52	63.5	78.1	11.4	26.0
发展中国家(含中国)	19.9	10.2	43.4	18.4	5.94	2.44	41.3	69.6	6.3	11.3
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	20.8	13.0	44.5	21.4	5.99	2.72	40.3	67.2	5.5	9.4
非洲	21.5	23.9	48.1	32.5	6.59	4.31	37.6	61.7	5.3	5.4
亚洲	18.8	6.2	41.7	14.3	5.71	1.94	42.0	72.5	6.7	13.5
欧洲	10.4	-3.7	22.2	9.2	2.70	1.48	62.8	77.0	11.8	26.0
拉丁美洲	26.3	6.4	43.6	14.8	5.80	1.86	48.6	72.2	5.2	13.1
北美洲	13.6	1.4	23.2	10.9	2.97	1.64	68.0	77.7	12.1	23.2
大洋洲	15.9	9.1	27.7	15.6	3.67	2.15	61.4	79.4	10.9	17.4

注:结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数据,作者自制。

在阐述中国人口领域引领全球治理新范式之初,有必要先梳理全球治理的初始概念与理论争议。詹姆斯·罗斯瑙(James Rosenau)是最早提出全球治理概念的学者。1992年,为描述与概括世界政治秩

序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指“人类活动所有层面的规则体系——从家庭到国际组织,以及为了实现这些规则而进行的具有跨国影响力的控制活动”(Rosenau J N, Czempiel E O, 1992)。虽然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同年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采纳了该概念,但是这一术语及内涵在此后三十余年间饱受争议。不仅有学者明确指出,罗斯瑙的概念界定本身过于宽泛,几乎包纳了一切人类事物(Finkelstein L S, 1995);而且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领域内部的不同理论流派对此概念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此外,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传播等其他学科对全球治理概念脱离现实,不以真实全球问题为基础的学理缺陷,也提出了严厉批评(戴维·赫尔德,2004)。即使部分学者结合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或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等特定领域展开个案研究,全球治理的既有视角也一直无法脱离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博弈的大框架,从而导致全球治理的宏大目标始终未能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问题及现实需求相对接。

为此,我国学者在阐释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时提出“中国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特殊理论视角”,即选取某一务实问题,将国内层面的国家治理与国际层面的全球治理进行交互拓展(蔡拓,2004)。首先,将全球治理锁定于某一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其次,关注该问题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治理成效,以此判断其治理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或者全球治理的基础形式;最后,具体从国家治理的制度外溢与利益共享的具体机制,对该领域全球治理进行新的框架设计与示范倡导。不过,也有研究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主导过全球治理的任何制度,也就意味着中国内部制度没有外溢为全球治理制度”(胡键,2023)。无论是能源安全与全球能源新秩序,还是维护世界和平与打击恐怖主义,抑或是海洋保护与数字经济等当前全球治理的新议题,中国总是扮演单纯的参与者角色。事实并非如此,俯瞰我国人口新国情与高质量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醒而又理性地观察到,中国在世界人口治理格局中扮演着“参与者、改革者、设计者、倡导者与建设者”等多种角色。

按照上述逻辑,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的理论含义与实践转向,与此前全球治理的宏观基调具有显著差异。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人口治理革新的内涵互洽与理论互构的逻辑关系在于: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将以世界人口发展的现实风险与长周期变化为研究对象,关注一个国家在实践中的人口治理状况,以此为导向归纳其如何影响并推动该领域全球治理的基本范式之优化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是罕见的社会变迁,呈现诸多独有的特点,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跨越式发展和发展阶段叠加,人口规模庞大,世界影响深远。”(李培林,2021)就此而论,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具有范式创新的独特作用,在不颠覆或推翻全球治理体系既有理论框架的同时,也能继续保持当前国际人口制度的公共约束,并以此为前提,在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及外延进行更有整体性与开创性的革新。有研究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内涵要义,并且进一步体现在人口规模优势论、人之美好生活本质论、人的全面发展认识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论、人口安全价值论这五个方面(朱荟,2023)。上述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的新逻辑、新样态与新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人口治理革新不仅为破解“全球治理失败论”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更是将全球化与现代化置于互动格局,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优先理念,助力全球人口治理建立新规制。具体的逻辑关系推演如下。

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重特征,以“人口规模优势论”作为新全球人口治理在主体样态上价值创新,从根本上纠正了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改变传统全球人口治理框架中过多关注“人口爆炸”“增长的极限”以及“人口分母效应”等视角,强调人口均衡发展的新理念。作为多年保持世界人口第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被列为“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一数值自2013年以来始终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即使在2022年全球人类发展因新冠疫情而首次倒退的情况下,中

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保持增长的国家之一。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重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人之美好生活本质论”作为新全球人口治理在本质样态上的理念重塑,应对人口与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中难以解决的经济不平等加剧和中低阶层的压力加大等具体面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7亿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并且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为全球消除贫困人口贡献率达到70%。可以认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长期努力的奋斗目标。有研究从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多维谱系方面指出,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包含政治主体、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三个视角,从进一步对外开放、二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乡村振兴、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多条路径展开,具有重大的全球借鉴意义(郑永年,2022)。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重特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认识论”作为新全球人口治理在发生样态上的制度外溢,化解人口与社会领域全球治理中无法忽视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个人中心以及社会排斥与结构化割裂等困境。此外,在人口与技术领域,中国始终将创新视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驱动力,中国不仅提供税收优惠和促进产学研协同,而且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2022年研发支出增至3.09万亿元(占GDP的2.6%),这一数值与全球平均水平2.6%持平,仅略低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人口与技术领域的创新为减少新冠疫情的社会隔离、维持线上工作学习以及避免老年数字鸿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复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四重特征,以“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论”作为新全球人口治理在结构样态上的关系再构,重新阐述人口与环境领域全球治理中两者的互相共生关系,即人口再生产不再意味着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等。2020年,中国政府宣布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此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建设低碳经济的力度。2022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125GW,同期欧盟和美国分别为57GW和16GW。中国也成为少数拥有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主流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最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重特征,以“人口安全价值论”作为新全球人口治理在秩序样态上的利益共享,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与携手共建美好新世界,在开放包容的价值秩序上为人口与政治领域的全球治理奠定合作共赢基础。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扭转了全球治理中“弱政府”的理论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以欧美国家为典范的全球化浪潮之所以遇到很多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在国内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政府”反而有实力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维护全球政治经济不被少数寡头政治体所统治或跨国公司所垄断。另一方面,新全球治理应摒弃既往的西方视角,当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新主角,那么全球人口发展将获得新动力。近年来,中国推行共建“一带一路”等全球倡议,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而言之,基于新全球治理的生成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的价值创新者、理念重塑者、制度外溢者、关系再构者与利益共享者。可以认为这种全球治理制度前所未有的生成方式,不仅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领域新全球治理中将扮演全新的角色,而且体现出中国为全球人口治理的新制度生成所发挥出的创造性贡献。简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既造福本国人民,也对新全球人口治理产生了较为深远的世界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与全球人口同频共振之中,中国释放出举世瞩目的人口红利,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中国奇迹”。在人口领域的新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不再是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的模仿者与跟随者;伴随着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开始成为新全球人口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者、合作者与贡献者;世界的人口大国就该有“大的样子”,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首要特征,同时也兼顾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的人口迁移流动现代化,以及从城乡二元到乡村振兴的人口和区域协调发展之现代化(吴重庆,2023),中国更加主动参与全球人口治理,积极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的行动方案。

这个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口事业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人口领域的新全球治理体系中真正转变为推动者、倡导者和引领者。毋庸置疑,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的中国,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之中央,努力成为新世界人口发展的先驱者、新国际人口秩序的践行者和新全球人口治理的开拓者。

结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全球引领

“中国问题”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之核心在于人口。20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肯定地提出:“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伯特兰·罗素,2019)因此,世界人口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与新全球治理的研究内容与意义,关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两个关系既体现出中国人口发展于世界之意义,也彰显出人口、物质与制度这三大层面如何协调及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事实上,先不论全球化与现代化在概念上的相互交织或历史进程上的时间叠加,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共同作用下,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与人口发展的所有方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从零散的村落到集中的城市化,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网络化与科技智能化,以及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分布、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人口观念的综合转变,塑造出一个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按照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中的说法,过去“简单的、线性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工业现代化”进程早已被一个超级复杂的未知性过程所代替(Beck U,1999)。在这样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世界人口发展需要同时应对贫困、疾病、饥荒、污染和战争等全球性风险与现代化危机的双重挑战。贝克将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外部环境称为“后工业社会”或“第二个现代化”,相较于民族国家环境下的、集体生活方式的、可控制性的、充分就业却有资本主义剥削的第一个现代化,这一个新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关系极其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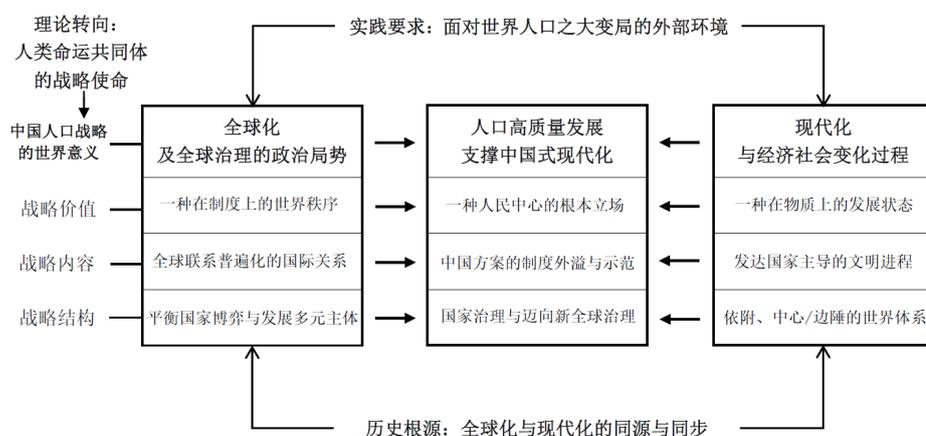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化新征程的学理定位与全球引领

2023年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新冠疫情以来的首份《人类发展报告(2021—202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022)(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2),并再次提醒世界,当前的全球状态令人担忧也充满挑战:先从世界人口整体进程上说,地球处于人类文明进程中较为危险的阶段;再从全球化角度说,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与工业革命类似的全面变革之中;最后从现代化维度说,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并没有走向趋同,相反却是走向普遍存在且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更是将一直隐藏起来的传统全球治理弊端与西方式现代化难以复制等问题,更为彻底地展

现在世界人民面前。需要警醒的是,人类正逐渐失去对未来的控制,过去赖以维持繁荣和稳定的现代化制度和全球化规范并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复合型不确定性”,全球人口的不安全感几乎都在上升。为此,有研究提出论断,政府组织的最终形式业已确定,人类意识形态的进化发展也已经走到终点(弗朗西斯·福山,2014)。

其实不然,一方面三十余年过去了,世界人口发展、文明进程与全球治理格局仍在延续与变化;另一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一步提醒到,全球人类发展与世界人口秩序都应当加入中国的视角,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为全人类发展所带来的新驱动力。自从工业革命催生资本主义繁荣以来,现代社会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纷繁复杂,具有极强不确定性,但是不外乎三大趋势主宰着变化之根本,即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另辟蹊径的中国崛起。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下世界人口大变局并不仅仅意味着风险或者危机,而只是需要迎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种新的物质发展状态以及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模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意味着一个较为笃定的未来。中国始终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使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发展更是全世界的机遇。”(人民日报评论部,2019)换言之,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世界意义,无论是战略价值、战略内容还是战略结构都做出与新全球治理与现代化新征程相适应的调整。百年未有之世界人口大变局的实践要求下,中国智慧尝试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兼治,而非分而治之。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方案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外溢与示范作用。更进一步地说,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拥抱外部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转向面对复杂局面的政治博弈,以更好的制度设计和为之奋斗的恒心促进世界人口朝向协调有序稳定之处发展,可能是全人类共同应对有限的全球化、不确定的世界人口大变局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最优策略。

[参 考 文 献]

- 蔡国华等. 世界人口发展的理性思考.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3—25.
- 蔡拓.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2004(1):94—106.
- [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编. 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7.
- 段塔丽. 中国古代人口控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人文杂志,2002(1):128—133.
- [美]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02—28).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 国家统计局. 周宣王料民——中国最早的人口调查.(2023—01—01). http://www.stats.gov.cn/zs/tj/shi/gd/202301/t20230101_1903362.html.
- [美]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2—165.
- 侯文若. 走出人口爆炸的困境. 北京:中信出版社,1991:15—21.
- 胡键. 全球治理制度的生成逻辑与中国角色.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0—33.
- 李培林. 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2021(12):4—21.
- 联合国. 我们的共同议程.(2022—03—05). <https://www.un.org/zh/common-agenda>.
- 刘宏松.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25—35.
- 陆杰华. 国家治理视域下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 人口与经济,2023(1):1—7.
- 庞中英. 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 社会科学,2016(12):3—11.
- [英]伯特兰·罗素. 中国问题.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1—3.
- 秦亚青. 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4—18.
- 人民日报评论部.“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70年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人民日报,2019—09—16(5).

- 邬沧萍. 1954年罗马世界人口会议. 人口研究, 1979(2):55—61.
- 吴重庆.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6—8.
- 吴志成. 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发展的重要特征. 现代国际关系, 2023(1):5—13.
- 吴宗钊. 当代世界人口激增的特点及其影响和展望. 人口学刊, 1984(4):15—19.
-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10—25).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薛澜, 俞晗之. 迈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问题—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1):76—91.
-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1):20—32.
- 张发林. 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6):106—131.
- 郑永年. 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1—8.
- 朱荟. 以中国式现代化助推人口发展战略新格局. 社会科学辑刊, 2023(4):155—164.
- 朱荟, 陆杰华. 人口负增长的世界性现象与中国式应对.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3(4):21—29.
- Beck U.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119.
- Coleman D. Immigration and Ethnic Change in Low-fertility Countries: A Thir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6(3):401—446.
- Finkelstein L S. What i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1995(1):367—372.
- Kirk 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1996, 50(3):361—387.
- Rosenau J N, Czempiel E O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29.
- Thévenon O.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37(1):57—87.
- United Nations. Day of 8 Billion. (2022—11—15). <https://www.un.org/en/dayof8billion/>.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2——Uncertain Times, Unsettled Lives: Shaping Our Future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2022—09—08).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1-22>.
- Vollset S E, Goren E, Yuan C W, et al. Fertility, Morta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cenario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from 2017 to 2100: A Forecasting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The Lancet*, 2020, 396(10258):1285—1306.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